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秋瑾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秋瑾

在浙江绍兴繁华的市中心，有一名为轩亭口的丁字街口，那里矗立着一座纪念碑，碑高七米，呈方形尖顶，碑身四周有石柱，碑上镌（ju n）刻着七个镀金大字“秋瑾烈士纪念碑”，这里就是当年秋瑾英勇就义的地方。

秋瑾生活的时代，正值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处在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妄想瓜分中国；清政府政治腐败，成为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的帮凶。而中国人民不甘受奴役，爱国运动风起云涌，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斗争中，爱国志士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以自己的生命争取民族的解放。在无数先烈中，秋瑾是近代第一位为革命牺牲的女革命家，她的英雄事迹彪炳青史，永放光芒。

一、习文练武的才女

秋瑾原名秋闺瑾，字璿卿，号竞雄、鉴湖女侠等。秋瑾祖居浙江山阴县（今绍兴市），但在她祖父时已离开了故乡。

1879年11月8日，秋瑾诞生在福建闽侯一个官宦人家。当时，她的祖父秋嘉禾在厦门、漳州一带任清朝知县，他任了好几任知县，为官清廉，政绩显著，当地老百姓称他“秋老大”，（这是当地人对长辈的尊称）秋瑾的父母随侍身边，她就在厦门、漳州等地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光。

1840年鸦片战争中，中国遭到了失败，清政府与英、美、法等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人民深受外国侵略者的压迫和剥削。特别是到了秋瑾的童年时代，这种压迫和剥削愈演愈烈。资本主义国家的鸦片和各种商品像潮水般涌进中国，列强疯狂地掠夺中国的财富，使中国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不仅如此，列强还以文化侵略中国，许多传教士打着传教的牌子，横行霸道，为非作歹，欺压中国百姓，也不把清朝官员放在眼里。当时的厦门是通商口岸（按照中英《南京条约》规定），漳州也是海防重地，这些地方都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首先入侵之地，当地人民所受之害也格外深重。有压迫就有反抗，外国侵略者的罪恶行径，激起了广大中国人民强烈的不满和反抗。在秋瑾童年生活的福建，1880年就发生过延平（今南平）人民反对外国教会的激烈斗争。

秋瑾的祖父秋嘉禾作为清朝政府的地方长官，经常要处理那些“教案”（中国人民反对外国宗教侵略而引起的中外纠纷）和其它各种交涉。当时，清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媚外，不敢与洋人抗争，地方官同飞扬跋扈的侵略者打交道时，只能事事迁就，经常受他们的气。秋嘉禾时常在家人面前流露出心中的不平和怨恨，使幼小的秋瑾深深感到侵略者的可憎。她对母亲说：“红毛人这样厉害，再不把他们赶出去，中国人岂不是要成为他们的奴隶了。”“亡国”的阴影已经在她心中模模糊糊地产生，激起了她朴素、单纯的爱国思绪。

秋瑾有兄妹四人，一般生活在封建官宦家的女孩子没有读书机会，可她小时候偶然听到哥哥在书房的读书声，好奇地走进去，看到教书先生是她的表伯，老先生教了她几个字，谁知她一学就会，很惹人喜爱。秋家又是书香门第，秋瑾从小就受到较好的教育。在兄妹中，秋瑾的天资最高，记忆力很强，她十来岁时就读了《四书》、《五经》，11岁学会了写诗填词，她的祖父看着孙女这样聪明叹道：“可惜阿瑾是个女孩子，如果是男孩，考起来不怕不中。”以后秋瑾又读了很多历史著作和文艺作品。她喜欢阅读陆游、辛

弃疾等爱国诗人充满民族大义的诗篇，也喜欢描写古代剑侠故事的作品，深为书中那些英雄人物的事迹所感动。有一次她读一本传奇小说《芝龛记》，有感书中的女英雄，欣然提笔写了八首小诗，其中有两首这样写道：

莫重男儿薄女儿，平台诗句赐蛾眉。
吾侪得此添生色，始信英雄亦有雌。
肉食朝臣尽素餐，精忠报国赖红颜。
壮哉奇女谈军事，鼎足当年花木兰。

秋瑾也想往着当一个女中豪杰，干出一番事业。

1891年初夏，秋嘉禾弃官回籍，秋瑾随同家人回到了故乡绍兴。秋家在绍兴南门租了一所叫和畅堂的房屋。这所房屋，原为明朝神宗时大学士朱赓的别墅，完全是明代建筑形式，三间四进，虽不甚宽敞，房间却不少，秋瑾就住在第二进左边楼下。她少年时代的诗词是在这里写成，她牺牲前的秘密革命工作，也是在这里进行的。现在绍兴的“秋瑾革命纪念馆”就设在这所房屋里。

绍兴古称会稽，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不仅风景如画，物产丰富，而且自古名人辈出。最早可追溯到大禹王。大禹治水13年中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据说大禹王就葬在绍兴城东南的禹陵。春秋时期，越王勾践从吴国回来后卧薪尝胆，最后终于灭吴雪耻的故事，更是妇孺皆知。这里还涌现过著名爱国诗人陆游、徐渭；坚持民族气节的官吏唐琦、刘宗周和不畏强暴，抗击倭寇的农民姚长子。故乡先贤们爱国的事迹，英勇献身的精神，使少年秋瑾激动不已，她恨不得自己是个男儿，为挽救灾难深重的祖国多出些力。

性格豪放的秋瑾在一首《满江红》词中这样抒发感情“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性格酷似男儿的秋瑾，十分想往能向武艺高强的人求教。在福建厦门时，她就听母亲说过，萧山城里外婆家的舅父和名叫单老四的表兄弟熟通武艺。回到绍兴后不久，秋瑾和母亲一起来到外婆家，向舅父和表兄学习使棒、舞剑。她以满腔的热情投入习武活动，很快就学会了这些武艺，还学会了骑马驰骋的本领。

从外婆家回到绍兴之后，秋瑾坚持不懈地练习武艺。她家所住的和畅堂后面，就是绍兴城里著名的塔山。塔山面积不大但古已有名，据说越王勾践观天文、卜凶吉就在这里。秋瑾经常早早地走出和畅堂后门，踏上塔山山坡，走到山顶，认真习武，不仅武艺更为精湛，身体也健壮起来，这一切都有益于她以后的革命工作。

二、革命当自家庭始

在故乡绍兴度过了大约一年奔放无羁的少女生活之后，秋瑾随家离开浙江前往台湾。秋瑾的父亲秋寿南接受了台湾巡抚邵友濂聘请，任台湾巡抚文案。1894年邵友濂调任湖南巡抚，秋寿南亦赴湘候补，秋瑾又随父来到湖南。秋寿南开始被签发到常德县厘金局，后又调到湘潭县厘金局作总办，全家也迁到湘潭。这时，秋瑾已是一个待字闺中的大姑娘了。

尽管秋瑾的父母十分疼爱自己的女儿，但是在2000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婚姻制度束缚下，秋瑾还是没有逃脱婚姻的悲剧。经过媒人说合，她与王廷钧于1896年结婚了。

王家是个暴发户。王廷钧的父亲名叫王黻丞，绰号王二胖子，是湘乡县荷叶种冲（今属双峰县）人，与曾国藩是同乡兼表兄。曾跟随曾国藩当过随营帐房，因而暴富，回家购买了数以千亩的良田，并在湘潭县城开设了“义无当铺”，把家属也迁到城里，成为湘潭的首富。秋瑾父母认为这门亲事还算得上门当户对。可是秋瑾嫁到王家，发现与娘家的慷慨、厚道的家风截然不同，王家很刻薄、吝啬，在这样的环境里，她时时处处感到格格不入。

秋瑾的丈夫王廷钧，从小养尊处优，好逸恶劳，是个十足的浪荡公子哥儿。加上他“状貌如妇人女子”，所以豪爽不拘的秋瑾在思想、性格上与他不合，亦谈不上有什么感情。然而，在封建社会里，“出嫁从夫”是女子必须遵循的金科玉律。过着这样痛苦郁闷的生活，秋瑾只得以饮酒和写诗排解抑郁。新婚之初她就写了《思亲兼柬大兄》，其中细致地刻划了缺少知音的痛苦和不满：“一样帘前月，如何今照愁？”想起在娘家时的生活那样快乐，如今在一样的月光下而是满腹愁肠。“敲棋徒自谱，得句索谁和？”“却怜同调少，感此泪痕多。”诗中丝毫没有新婚的幸福欢乐，而是孤独、惆怅，得到佳句无人和，下棋只能自己对奕，一想到这里，秋瑾便会潸然泪下。这时她还没有接触到革命的新思想，只得在王家消磨宝贵的青春。然而王家的重宅深院和锦衣玉食并不能消磨她豪爽的性格和对劳苦人民的同情心。

当时王家有个女仆吴妈，她的儿子在湘乡老家租种了地主曾五爷的田地，平时只能勉强糊口。一年遇天灾无力交租，曾家几次讨租不得，便仗势欺人，写状纸给在湘乡任盐务督销的秋瑾父亲秋寿南，诬告吴妈的儿子是私盐贩子，要求将他彻底查办，这个曾五爷是曾国藩的侄子，与王家有亲，所以尽管吴妈急得暗中流泪，也不敢告诉主人家。秋瑾得知这个消息后，深深同情吴妈一家不幸，便亲自到湘乡找父亲，说明事情的原由，要父亲主持公道。秋寿南终究是个清官，虽然感到碍于亲家的情面而为难，最后仍秉公办事，使吴妈的儿子得以免受冤屈。

就在秋瑾挣扎于王家的“网罗”之中时，中国大地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变法维新运动，它震撼着清王朝的反动统治，也动摇着使秋瑾深切痛恨的封建纲常伦理。早在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为了求和清政府派重臣李鸿章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个条约不仅使中国割地（割去台湾、澎湖及辽东半岛）、赔款（二万万两白银）、开放通商口岸（沙市、苏州、杭州、重庆），而且允许日本人在中国的通商口岸投资办厂，从事各种工艺制造，这个条约大大加深了中国殖民地化的程度。消息传来，正值全国各地举人云集京城会试。以康有为为代表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从此，要求变法的风潮遍及全国，其中以湖南变法运动最活

跃。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积极支持变法，在这场变法运动中的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人士在湖南开办了“财务学堂”办起了《湘报》、《湘学新报》，提倡变法救国，使原来以“守旧闭化名天下”的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这样的社会风气同样影响着秋瑾，她的哥哥当时在北京路工局任职，经常给她寄来新书报，她也常差人上街去买新书报，这些书报给秋瑾沉闷的生活增添了色彩，使她了解到外面风云变幻的世界。这一切在秋瑾的思想深处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使她能冲破家庭的樊笼，最终走上革命的道路。

1898年6月，光绪皇帝接受维新派人士的建议，接连下诏变法，推行新政。就在维新变法方兴未艾之时，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派破坏变法，发动了政变，囚禁光绪皇帝，大肆捕捉维新派人士，戊戌六君子血染京城。其中谭嗣同事先得到了消息，但他不走，说：“各国变法没有不流血的，今天还没有听说中国有人为变法流血，所以变法不能成功。如果要为变法流血就从我开始吧。”虽然变法运动失败了，但志士的血没有白流，他们以自己的生命惊醒国人：为中华民族图存必须与封建顽固派作斗争。这一切又给秋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899年前后，王廷均花了近万两银子捐了户部主事这个京官，于是带着秋瑾和儿子上京去了，到北京后，住在南横街圆通观附近的一所小宅院里。

北京毕竟不同于湖南湘潭。秋瑾第一次来到京城，即深切感受到清政府官场中勾心斗角腐败无能，加之她初次到京“室因地僻知音少”更增烦闷。同时，戊戌变法虽未成功，却也给社会带来一些变化，如：兴办学堂，办报纸，有一定的出版结社权利，她更多地接触了一些新书刊。国家的兴亡，使她这个心比男儿烈的女子忧心忡忡。

秋瑾在京时间不长，中国又掀起了如火如荼的义和团运动，扫荡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冲击着清政府的腐败统治。俄、英、美、法、意、德、日、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维护他们在中国的既得利益。组成一支侵略军，肆无忌惮地屠杀中国人民，掠夺中国财富，破坏中国城镇，使人民又一次陷入空前的战乱之中。1900年夏秋之际，秋瑾和王廷均离开北京回到别离一年的湖南。

秋瑾回到湖南仍然观注着北方战事，她不断听到八国联军在京、津一带的暴行，心中非常激愤。从她所写的《感事》这首诗中，可以看出她这时的心情：

竟有危巢燕，应怜故国驼，
东侵忧未已，西望计如何？
儒士思投笔，闺人欲负戈。
谁为济时彦？相与挽颓波。

诗中的“故国驼”是个典故，晋朝将亡时，索靖感叹洛阳宫前的铜驼将陷在荆棘之中。在这里，“危巢燕”与“故国驼”都指中华民族将要面临亡国的危机。诗的大意为：中华民族正处在危机之中，中日甲午战争的忧虑还没有停止，又面临着西方帝国主义的瓜分，该如何办呢？在民族存亡时刻，读书人想投笔从戎，妇女也欲持刀枪上战场。谁是挽救国家民族的志士？我将与他一起战斗。诗中表现出秋瑾一片热忱救国之心，正是这样强烈的愿望，促使她后来留学日本，寻求拯救祖国的真理。

民族的灾难和家庭的不幸同时向秋瑾袭来，1901年11月，秋寿南在桂

阳任上病逝。秋瑾的母亲，兄弟将灵柩护送到湘潭择地安葬。失去了亲人的秋瑾一家，不忍再次骨肉分离，在湘潭住了下来。为了生计，秋瑾的母亲与王廷均家合股开了“和济钱庄”。秋家对经商完全外行，原想得到王家帮助，谁知王家介绍来的人行为不轨，第二年钱庄便破产了。经过这样的打击秋家衰落了。王家本来就势利，两家联姻是建筑在“门当户对”基础上，秋家的衰落，失去了共同基础，自然对秋家的态度也冷淡起来。秋瑾的母亲和兄弟便于1902年下半年回到远在千里之外的故乡绍兴。秋瑾别无他法，只有含泪送别亲人。

义和团运动最终以清政府向外国列强屈膝投降，签订《辛丑条约》而结束。这次不仅赔了款，允许北京附近驻“洋兵”，京城东交民巷建外国使馆，还特别提到不许中国百姓有反抗侵略者的行动。曾惶惶出逃的慈禧又回到了京城，一面对外国侵略者感恩戴德，派了官员向各公使馆送冰块、水果等慰问，一面对义和团运动大加指责，“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剿除不可。”清政府已到了寡廉鲜耻、腐败透顶的地步。

战乱中避难的达官贵人们陆续回到了北京。1903年春，王廷均也携眷回京复职，秋瑾第二次到京城，住进绳匠胡同（丞相胡同）与吴芝瑛为邻。

吴芝瑛是清末著名的桐城派（清朝散文流派，因创始人及发展者皆为安徽桐城人而得名）学者吴汝纶的侄女，她不仅精通诗词，并写得一手好字，被人称为女书法家。她的丈夫廉泉与秋瑾的丈夫王廷均都在清政府的户部任职。

当时义和团运动的强大风暴虽然已经过去，可是人们对八国联军的侵略罪行依然历历在目：英国兵把抢来的东西公开进行大拍卖；日军从户部抢走三百万两库存白银，害怕罪行暴露放火烧了衙署；法国兵把中国百姓逼进死胡同，灭绝人性地用机枪扫射……而清政府对待列强和义和团的态度使许多人认识了它反动、虚弱和凶残的面目，被人们看成是“洋人的朝廷”，尤其是在爱国的知识阶层中，对清政府腐败的痛恨，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担忧，希望报效祖国的愿望等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为了标榜进步，缓解矛盾，清王朝宣布实行“新政”，以争取延长它摇摇欲坠的统治。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出国留学，接触到资本主义的文明；越来越多的书刊宣传资本主义的政治、历史、哲学和科技知识，像一股清新的空气，吹进了充满腐朽之气的中国社会，冲击着禁锢知识分子思想的封建纲常、伦理。

与秋瑾为邻的吴芝瑛夫妇思想较开通，常与书局、报界人士往来，秋瑾经常到她家看书谈论国事。加之两人对诗词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很深的造诣，常在一起吟诗作词，并且思想都倾向革新，交谈十分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吴芝瑛年长秋瑾七岁，秋瑾十分敬重她，两人感情日益加深，1904年2月便互换兰谱，结成盟姐妹。秋瑾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曾兴奋地赋诗表达自己的心情，“曾因同调访天涯，知己相逢乐自偕”，并且希望两人的友谊如古代管仲、鲍叔牙的情谊一般永世长存。

秋瑾在这段时间，如饥似渴地阅读新书、新报，这些书报大多是由一些进步青年在日本或上海等地出版的。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秋瑾的思想有了新的变化，渐渐形成冲破封建伦理束缚，以行动救民救国的思想。秋瑾曾给她的朋友王时泽写信：“吾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这里已表明她的心迹：自从庚子年（1900年）以后，为了救国，不惜牺牲生命，即使看不到成功，也绝不后悔。

几千年来，加在中国妇女头上“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礼教，不知害了多少妇女。读了新书报，秋瑾很快接受了男女平权的思想。她对吴芝瑛说：“女子应该有学问，求自立，不应该事事依附男子。如今志士提倡革命，我说革命当自家庭开始。”秋瑾这样说也这样做，走出了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第一步——放足。她不但自己放了足，而且还在京城里联合几个女子组织《天足会》，动员更多的妇女放足，在家里，她宣布不给女儿缠足。为了像男子一样地强壮，秋瑾开始着男装。据日本人服部繁子回忆，她第一次见到秋瑾着男装的样子：穿着西式的裤子、茶色的皮鞋，蓝色的鸭舌帽盖住了半只耳朵，露出披散蓬乱的黑发……服部繁子问秋瑾，为什么要这样打扮，秋瑾回答说：“我想变成比男子还强的人，首先从形貌上变，再从心理上变……”这些行动既表现出秋瑾强烈的反抗精神，对封建礼教的蔑视，也表明她当时对男女平等的认识是肤浅的。

这段时间里，秋瑾写了很多诗词。诗言志，在这些诗词中充分表达了她的远大抱负。与前一个时期她的诗中常表达的未遇知音的感慨、深闺生活的哀愁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其中《宝刀歌》和《宝剑歌》最能代表她这个时期的思想。《宝刀歌》中有一段这样写“沐日浴月百宝光，轻生七尺何昂藏？誓将死里求生路，世界和平赖武装！”写出了秋瑾要用闪闪发光的宝刀，为祖国的复兴而战的豪情，并认识到要求得中华民族一条生路，求得世界和平，只有靠武装。《宝剑歌》中这个思想表达得更清晰“世无平权只强权，话到兴亡眦欲裂。千金市得宝剑来，公理不恃恃赤铁。”这是一个没有“公理”、“平权”的世界，秋瑾决心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死生一事付鸿毛，人生到此方英杰”。成为为国捐躯的英雄豪杰。读着这充满激情的诗篇，我们仿佛看到秋瑾一身戎装，挥戈驰骋疆场的英姿。

秋瑾的思想和行动与王廷均越来越不相投。王廷均深为不满，不时加以干涉，但并不能阻止秋瑾。有一次，秋瑾穿了西装，带仆人去京看戏，王廷均异常恼怒，竟然将秋瑾打了一顿。那时候，男子在家庭生活中可以随心所欲，娶妾也好，逛妓院也好，女人却不能干涉。王廷均纨绔习气十足，但他不能容忍秋瑾的行为中有一点不符合封建礼教的要求。秋瑾岂甘忍受，愤而出走，住到了泰顺客栈。

夜深人静，孤灯冷屋，秋瑾独自在屋中，想自己八年来的婚姻生活，琴瑟异趣，夫妻不合，这样的日子何时才能到头？自己立下了志愿要做女中豪杰，必得进行家庭革命，冲破这封建牢笼。

秋瑾的出走，使王廷均很难堪，官宦人家怎么可以出现这样的事情呢？他赶紧派出大批仆妇，轮番前去巧言劝说，又再三请吴芝瑛去调解。秋瑾想到家中幼小的孩子，看到王廷均着急的样子，以为他有悔改之意便回到家中。谁知王廷均非但没有悔改之意，而且还“举动更厉于前”，对秋瑾的看管更严了。她终于对丈夫完全失望了。

1904年初，吴芝瑛等人在京组办了“妇女谈话会”，主要是联络一些在京的官太太们，不定期地聚在一起或探讨学问，或议论国事。参加“妇女谈话会”的，不仅有中国人，还有一位其夫在京帅大学堂任职的日本人，名叫服部繁子。2月份，秋瑾参加了“谈话会”的聚会，结识了服部繁子，她向秋瑾谈起了日本的经济情况，讲述了日本女校的课程，学习的好处。那时中国知识分子留学日本的风气很盛。1901年有二三百人，至1904年初已有一千三四百人。秋瑾在留学浪潮的激励下，心已所动，这次再听了服部繁子的

介绍，更坚定了出国留学的决心。她认定，只有出国才能自救自立，施展抱负，拯救祖国。她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盟姐吴芝瑛。吴芝瑛听后沉默了一会儿，抬头对秋瑾说：“一个女子只身远涉重洋去求学，会遇很多困难，你考虑好了吗？再说，孩子怎么办？子芳（王廷均）恐怕不会同意。”秋瑾站起身，望着窗外冬日凋零的景色，灰濛濛的天空，坚定地说：“几十年后，女学在中国一定会大兴起来的，但是，如果今天没有一个女子敢去读书，提倡女学，那女子自立就是一句空话。姐姐平日也是赞同女子要有学问，求自立的呀！”见秋瑾说得这样有理，这样坚定，吴芝瑛心里暗自佩服她的胆识，心想一定要帮助秋瑾实现她的愿望。孩子怎么办？留学经费怎样筹集？秋瑾是个不畏困难、勇往直前的人，只要她认定了目标，就会顽强地去争取，直达到目标为止。她决定将孩子留下来，经费如果王廷均不给，就变卖自己的首饰。

王廷均得知秋瑾要出国留学，果然极力反对，不仅在经济上不给任何帮助，还卑劣地偷走秋瑾陪嫁的珠帽珠花等财物，想以此达到阻止她出国的目的。但秋瑾心志已决，万难转回，此举只能恶化她和王廷均的关系。秋瑾将剩下的首饰托人变卖，艰难地凑集了一笔不多的款子。

尽管留学的经费不多，素有侠义心肠的秋瑾在别人有难时，欣然资助。就在她将离开北京之前，得知这样一消息：前礼部主事王照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逃到日本，回国后知道与他相熟的沈荇已被清政府捉捕杖死，亦不愿偷生，自首入狱。秋瑾为他的勇气所感动，出于对维新派的敬佩，从有限的经费中取出部分，托人送到狱中，以备他周旋官府所用，并叮嘱不要提起她的姓名。秋瑾与王照素不相识，而解救他于危难之中，这哪里是一般平庸卑劣的人所能做到的呢。

秋瑾就要走了，她的盟姐吴芝瑛和京城女友们在北京和平门外陶然亭为秋瑾饯行，想到这次回到京城还不足一年，就要天各一方，大家不禁黯然。酒席中，秋瑾填《临江仙》一词，表达惜别之情。

1904年6月，秋瑾告别了祖国和亲人，与回国探亲的服部繁子一道，乘火车离开北京到天津，又从塘沽乘德国客船“独立”号东渡日本。

三、两赴日本求真理

船静静地行驶在浩瀚的大海中，秋瑾站在甲板上极目远眺，思绪万千。她只身一人赴日本，不仅是为了求得自身的独立，更要寻求救国的真理和革命的同志。想到这里秋瑾满怀激情，“漫云女子不英雄，万里乘风独向东”。秋瑾迈出了在她一生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同中国一样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自 1868 年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特别是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从中国掠夺了大量财富，加上在国内残酷地压榨广大日本人民，至 20 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便有了飞速发展，国家日益强盛，于是吸引了众多的中国学生到日本来留学。

7 月 2 日，“独立”号客船抵达日本神户港。秋瑾踏上了东瀛的土地，来不及很好地休息，又与服部繁子乘上火车。两天两夜后到达了日本首都东京。

随着中国赴日留学人数的迅速增加，留学生的情况也复杂起来。有的参加革命，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有的反对革命，宣传君主立宪思想；有的为了镀金，回国捞一官半职。但相当多的人是抱着富国强民的愿望到这里学习知识，求真理。如鲁迅先生所写他们“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演讲”。秋瑾的情况就是如此。她先到骏河台中国留学生会馆所设日语讲习所补习日语。她学习日语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就基本学会了用日语进行简单的听、说、读、写，为第二年考青山实践女校作了准备。

当时的东京有很多宣传革命的刊物，《湖北学生界》、《新湖南》、《浙江潮》等，著名革命宣传家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小册子也广为传播。秋瑾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刊物，感到精神无比舒畅。资产阶级革命派不仅办刊物，还经常组织集会。秋瑾热情很高，只要是浙江同乡会集会，她总是必到。就是湖南同乡会集会，她也每会必到。阅读刊物，参加集会，秋瑾的革命愿望，促使她结交了很多进步青年和革命志士。如 1904 年 8 月以前也在东京的鲁迅，1905 年初到日本的陶成章，还有宋教仁、王时泽、何香凝等，都与秋瑾有过或多或少的交往。秋瑾广交志士仁人，在海外觅得了知音。

秋瑾一边学习，一边积极投入社会活动。她在日本最初参加并组织的团体是个妇女团体“实行共爱会”。“实行共爱会”的前身“共爱会”是 1903 年由留日中国女生组织的，由于缺乏有力的领导和严密的组织，入会人数又太少，一直很少开展活动。秋瑾到日本后，重建了这个组织，并将原名秋闰瑾正式改为秋瑾。“实行共爱会”的会长是陈撷芬，秋瑾担任招待。她希望这个组织成为团结中国二万万妇女的机构，广泛开展妇女解放运动。她们还制定了“实行共和会”章程，提出“反抗清廷，收复中原”的口号。她们还将“实行共爱会”的章程向国内妇女界宣传。当国内传来封建顽固派破坏湖南第一女子学堂的消息，秋瑾立即写信给学堂的姐妹们，鼓励她们不要害怕，要争取男女平权，“欲脱男子之范围，非自立不可。”同时介绍日本女学的盛况，劝她们争取到日本留学，并随信寄去三十张“实行共爱会”的章程。

虽然“实行共爱会”在当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但它为秋瑾从事妇女

解放活动和以后的革命武装斗争，提供了某些实践经验。秋瑾在日留学期间一直从事着解放妇女的活动。不仅注意宣传，还以实际行动帮助妇女打破封建的婚姻枷锁，争取人身自由。

陈撷芬的父亲陈范是原上海《苏报》编辑，因《苏报》案的牵连（1903年夏《苏报》刊载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反清论文，被清政府查封）逃到日本·陈撷芬随父来日留学。陈范将女儿许给了一个广东富商为妾。陈撷芬很不情愿，但表示父命不得不从。此事在留学生中大哗，秋瑾召集全体留日女学生开大会，她激愤地说：“逼女作妾，就是乱命，事关全体女同学的名誉，非取消不可。”大家一致赞成热烈鼓掌，婚事因而未成。陈范有两名小妾，都是浙江人，秋瑾不赞成她们依附男人的生活，并认为有玷同乡的名誉，发起了浙江同学捐助两人的学费使两人终于脱离丈夫而独立。秋瑾在东京赤坂区留学生师范女校时，有一邻居女子名叫蔡行素。因丈夫时常虐待她，总是啼哭并要自杀。秋瑾气愤地说：“女子有这等非人的生活，非共同起来作斗争不可。”她多次去和蔡行素的丈夫交涉，将蔡救出火坑，并与她住在一起。以后回国探亲时，将蔡带回故乡绍兴，送她入新开办的绍兴手工学校读书，使她毕业后可自食其力。秋瑾在日留学时，经费很紧张，“每月费用则限止若干，不多用一钱”，可是看到被虐待的妇女，还是全心营救，是可见她的心热与责任感。

1904年秋，孙中山派冯自由、梁慕光在横滨成立“三合会”（合天、合地、合人之意）这是个秘密反清组织。秋瑾、刘道一、王时泽等人得知消息后，特地乘车前往横滨。

在横滨一条中国人聚居的街道（俗称南京街）某广东人开的商店里，有10个青年男女正在举行庄重的加入“三合会”仪式。

主持宣誓仪式的梁慕光，手执一把钢刀，架在秋瑾的脖子上问：“你来做什么？”

秋瑾回答：“我来当兵吃粮。”

“你忠心不忠心？”梁又问。

秋瑾声音洪亮坚定地回答：“忠心。”

“如果不忠心，怎么办？”梁进一步问。

“上山逢虎咬，出外遇强人！”秋瑾毫不犹豫地回答。

其余几个依次同样宣誓完毕后，冯自由和梁慕光横牵一幅六七尺长的白布，上面写了“翻清复明”四个大字，各宣誓人俯身鱼贯从布下穿过，表示忠于主义。又在室内烧一堆火，各宣誓人从火堆上跳过，表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最后，会员共饮鸡血酒，表示会员都是生死不渝、患难相共的结盟兄弟姐妹。在这次会上，刘复权被封为洪棍（此人后来变节，被黄兴枪决），秋瑾为“白扇”（即军师），刘道一是“草鞋”（即将军）。

加入“三合会”后，秋瑾的革命精神更强。对于志在反清的爱国青年引为同志，滔滔雄辩，无话不谈，广为结交。对于专讲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深恶痛绝，不相往来，有时还当面呵斥，毫不留情。对于借留学为升官发财途径的人，她最痛恨，展开面对面的斗争。有个浙江留学生胡道南就是这样的人。一次秋瑾因谈论反清革命与男女平权问题，彼此意见不合发生争执，秋瑾当面骂他是“死人”。1907年秋瑾在绍兴大通学校被捕，就是他向绍兴府知府贵福告的密。

为了能唤起更多的民众参加革命，秋瑾把演说视为革命斗争的一种武

器，她积极参与成立“演说练习会”，提供提高演说的技巧。她说：“开化人的知识，感动人的心思，非演说不可”。她自己经常登台演讲，身体力行。她的语言生动，感情充沛，讲到慷慨激昂之时听者无不为之感动。

在成立“演说练习会”的同时，秋瑾还倡办《白话报》。当时中国流行文言文，而白话文的文章浅显通俗，文化不高的妇女也可以读。1904年中秋节，《白话报》创刊，上面发表了以“鉴湖女侠秋瑾”署名的文章《演说的好处》，文中列出演说的种种好处，尤其在中国大多数劳动者不识字不能看报情况下，演说就更为重要。第二期、第三期的《白话报》上，亦有秋瑾多篇文章，她通过报纸宣传爱国，揭露清朝官场腐朽丑态，呼唤男女平权。

秋瑾经过半年紧张艰苦的学习生活，于1905年初在日语讲习所结业，报名转入东京青山实践女校附设的“清国女子师范工艺速成科”。她带来的经费快用完了，正值假期，他决定回国探亲筹措学费，并且帮助青山实践女校在中国招收师范、工艺两科学生。

此时，光复会首领陶成章来到了日本。陶成章在浙江一带会党中名望很大，秋瑾通过亲戚介绍认识了他。回国前秋瑾向陶成章了解浙江会党的情况，陶成章热情地将会党一年来的活动情况详细地告诉了她。秋瑾听了很兴奋，决心加入光复会，并与浙江各地的会党建立联系。陶成章开始认为她是女子，不适合搞武装起义，但经不住秋瑾的再三要求，还是同意了她的要求，并为她介绍了光复会的另外两位首领，即在上海的蔡元培和在绍兴的徐锡麟。

1905年春，秋瑾带着任务回到离别半年多的祖国。到上海后，她持陶成章的介绍信，去上海爱国女校拜见了光复会会长蔡元培，畅谈自己的思想与抱负。回到绍兴后，立即去寻访东浦热诚小学主持教务的徐锡麟。徐锡麟（号伯荪）个子不高，待人热情诚恳，会友都尊称他“伯荪哥”。经徐锡麟介绍秋瑾加入了光复会，使秋瑾在反清革命的道路上又向前跨了一大步。

“儿行千里母担忧”这是中国的一句俗语，秋瑾回家见到了日夜思念她的母亲，细细讲述在日本学习的情况和经济上的困难。虽然此时秋家早已衰落，可是慈爱的母亲不忍看到已是只身远游的爱女为筹集经费发愁，于是典卖了衣物为秋瑾凑了几百元钱。为了帮助实践女校招生，秋瑾奔走于杭州、绍兴等地，还向一些女子学校寄去招生启事，热情宣传女子走出闺房，轻装简束，东渡求学的好处，可是因封建阻力太重，收效甚微。这时学校来信催促，她便再次怀着惜别之情离开家乡赴日本。

1905年6月底秋瑾离开浙江到了上海，碰见了从日本回国的陶成章，在陶成章的介绍下，秋瑾结识了浙江会党头目丁铎、吕熊祥等人，这些人在秋瑾后来的革命活动中，给予了很大帮助。

1905年7月暑气逼人，秋瑾登上上海轮，整整六天的时间拥挤、劳累、寝食不周，使她刚到东京就大病一场。待病刚有好转，便于8月到青山实践女校报到注册。

青山实践女校是日本近代著名的女教育家下歌田子创立的，而女校附属“清国女子师范工艺速成科”是1904年下歌田子与当时驻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监督范源濂等人合办的，专门招收中国女留学生。学习期限为一年，分作三个学期。

秋瑾读的是附属学校的师范科。学校校规很严，单独外出或单独与外人会见，必须有保证人。除星期天外，每星期最多只允许出校门两次等等。开设的课程也多，有日语、教育、心理、修身、理科、历史、地理、算术、汉

语、图画、体操、唱歌等。学校的教育、管理和监督主要由日本教员担任。

学习刻苦是秋瑾的一贯作风。她在学校只念了一个学期，在这个学期里她共选读九门功课。每周上 33 节课，外加六小时自修课。每天阅读、写作常到深夜，经常要人再三劝说，才放下书本。为了保护身体健康，她经常做体操，进行体育锻炼。

刻苦学习的同时，生活却很清贫。由于留学开支大，所需学费、书籍、纸、笔和膳费等必要支出后剩下无几，秋瑾严格限制自己的其它花费。平时外出总是步行来往，这对缠过脚的人来说更增加了困难。

紧张的学习，清贫的生活和严格的校规并没有减弱秋瑾对革命事业的热情。她买了一把倭刀，时时带在身旁不忘习武。还到东京神乐坂武术会去练习射击，以便适应革命工作的需要。她甚至认真学习如何制做炸药，把别人有关制炸药的笔记全借来抄下。

1905 年是值得人们记忆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出现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大事——中国同盟会建立。随着国内民族资本的不断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也在增长。出国留学的人数猛增，革命的刊物大量涌现，革命小团体相继成立，革命形势迅速地发展。到 1905 年，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政党领导革命运动已是迫在眉睫。

1905 年 7 月，孙中山由欧洲抵达日本，在留日学生何香凝家设立临时联络点，会见在日本的中国革命志士。经过与黄兴、陈天华等人商议，决定以兴中会、华兴会为基础，联合光复会和其它组织成立统一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

7 月 30 日，东京赤坂区桧町“黑龙会”会所内气氛热烈而又紧张，来自 17 个省的留学生代表和一些日本友人共 60 余人，在这里举行中国同盟会的预备会。会上，孙中山详细地分析了中国的形势，指出了各革命组织联合起来的必要性。提出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中国同盟会的纲领，经过代表们热烈的讨论后通过。大会还一致推举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同盟会预备会议的内容迅速传到留日的革命学生中，激起了学生的极大热情。8 月 13 日，东京富士见楼聚集了 1300 多名学生，集会欢迎孙中山。孙中山作了激动人心的演说。8 月 20 日，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通过了会章，决定总部设在东京，又先后推定了各省的“主盟人”。同盟会的成立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还在 8 月中旬时，秋瑾经冯自由介绍加入同盟会。入会手续在黄兴的寓所履行。秋瑾举起右手庄严地发出誓言：“秋瑾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失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

宣誓完毕，由黄兴教给同盟会员相见时的握手暗号和三种秘密口号。

秋瑾加入同盟会早（是浙江籍留学生中第二人），素来立场鲜明，斗争性强，因此被举为评议员、浙江主盟人。这是秋瑾在革命道路上迈出的决定性一步，她将革命事业溶入了自己的生命之中。

反动的清政府不断地与革命势力较量，为了巩固统治，继 1901 年“新政”颁布后，1905 年又要准备“立宪”，派遣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为了阻止清政府骗局实现，一位革命党人吴樾在 9 月 24 日这天，以大无畏的精神怀揣炸弹，赶到了北京火车站。他要炸死这五个大臣。上车的人很多，还没有等吴樾靠近五大臣，怀里的炸弹被拥挤的人们激烈碰撞爆炸了。五大臣中只有两人受了轻伤，吴樾壮志未酬不幸牺牲。秋瑾听到吴樾的牺牲过程后，

心中万分悲痛。漫漫长夜，她悲愤地彻夜不能眠，奋笔疾书《吊吴烈士樾》“昆仑一脉传骄子，二百余年汉声死。……皖中志士名吴樾，百炼钢肠如火热。报仇直以酬祖宗，杀贼计先除羽翼。爆裂同拼歼贼臣，男儿爱国已忘身。”她不仅为烈士的舍身取义精神所感动，还号召天下同仁学习烈士“前仆后继人应在，如君不愧轩辕孙！”文章读来令人荡气回肠，在留日学生中争相传诵。

离吴樾牺牲不到三个月的时间，留日学生中又出现了一件让人痛心不已，充满牺牲精神的事情——同盟会领导人之一、杰出的宣传家陈天华投海自杀。

内外交困的清政府，得知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留日学生中宣传革命，还成立了中国同盟会，恐慌不安。多次要求日本政府驱逐留日的革命党人，并限制留日中国学生的活动。日本政府“贪中国之权利”，与清朝政府勾结起来，11月文部省颁布了所谓《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规定中国留学生只能入日本政府指定的学校，还必须有清朝公使馆的介绍信。对留学生的书信、活动、住宿等以登记或加以限制。规则刚一公布，留学生哗然，群情激愤的学生以8000人罢课的方式进行抗议。与此同时，组织敢死队与日本政府和中国驻日公使交涉，秋瑾被公推为敢死队队长，毅然率领敢死队前往。交涉毫无结果，还有些日本报纸诬蔑中国留学生是“乌合之众”“放纵卑劣”。面临困境和辱骂，应该怎样行动呢？留学生们自然地分成两派：一派主张立即回国，在上海办校，秋瑾、陈天华等持这个观点。另一派认为既然来求学，就要忍辱负重，学成以后归国。双方争执不下，甚至争吵起来。眼看日本政府对留学生的排斥，而留学生内部又混乱一团，陈天华心痛如焚，必须阻止日本政府关于《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的执行，结束留学生中无谓的争吵，让大家团结一心一致对外，陈天华决心以死来作警钟，惊醒留学界。12月8日陈天华这位血性男儿留下长篇绝命书，纵身跃入大森海湾，壮烈牺牲，死时才30岁。

陈天华之死震惊了留学界，也激起了留日学生的义愤。留学生们立即召开追悼会，由秋瑾主持会议。会上大家发言，表示要记住他的遗言“共讲爱国，更卧薪尝胆”。秋瑾满怀悲愤发表演讲，号召全体留学生回国，说到激动处，随手抽出倭刀，“啪”的一声插入桌子上，大声喊道：“若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最终没有实行，留日学生的斗争取得了胜利。待事情平静下来，许多学生感到：全体回国，中断学业，就是半途而废，只能使革命事业受损失。孙中山此时打来电报，不赞成全体回国。

秋瑾坚持义不受辱，决定回国，可也不似当初那样情绪激动。认为若真能忍辱以成救国大业，这样的辱是暂时的，而祖国强盛了则永不受辱。她还表示自己回国以后，要全力投入革命事业“成败虽未可知，然苟留此未死之余生，则吾志不敢一日息也。”意思是说：革命成功与否，虽然还不知道，可只要我活着就一天也不改这个志愿。

1905年12月底秋瑾由东京动身回国，结束了一年多的留学生涯。这一年中，秋瑾接受了资本主义文化教育，结交了大批革命同志，加入了光复会和同盟会，已从一个具有反抗封建势力精神，关心祖国命运的单纯女子成长为自觉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她肩负重任，以新的精神境界迎接新的挑战。

四、为妇女解放而呼号

1906年新春，秋瑾乘船回到祖国。在上海停留几日便回到绍兴。当她身穿紫色白条和服，头发盘顶进入家门时，家人竟一下子认不出她来。继而见秋瑾平安归来，全家人又有说不出的高兴。回家后秋瑾不再穿和服，着一身男装。月白色竹布衫，足登黑皮鞋，梳一条辫子，有的孩子只称她“秋伯伯”，这样的装束，直到她就义时从未改变。她是用自己的行动来开化封建闭塞的社会风气，争取男女平权。

回到家乡，她先在明道女校代上几天体育课。后来经人介绍，应聘为湖州南浔镇浔溪女校教习，担任日文、理科、卫生等课程。

南浔是浙西富庶的地方，秋瑾到这里希望能够对革命事业在经济上有所帮助。她一面认真教书，一面发展新会员，唤醒更多的女同胞起来反抗清政府的腐败统治。

浔溪女校的校长徐自华（字寄尘）是当地望族子女，颇有声望。她的妹妹徐双韵（字小淑）和吴希英（后改名惠秋）在校读书，是秋瑾的学生。她们都是受到秋瑾的启发、教导加入了同盟会和光复会成为革命者的。

秋瑾在浔溪女校教书仅有五个月，但她的学识和人品让徐家姐妹敬佩。她们在一起赋诗，交往渐渐深厚。秋瑾不仅向徐家姐妹讲述在日本留学的见闻，还热情宣传男女平权的道理。这些革命思想如甘泉般流入徐家姐妹的心田。徐寄尘丈夫早亡，原只会哀怨命运的不公平，秋瑾劝她在国家前途危亡的时刻，不要过于眷恋家庭小圈子，而要关心国家大事。在赠给她的诗中写道：“祖国沦亡已若斯，家庭苦恋太情痴；只愁转眼瓜分惨，百首空成花蕊词。”对徐小淑，秋瑾既是她循循善诱的师长，又是相交甚笃的朋友。秋瑾给徐小淑的诗中表达了对朋友的诚挚“惺惺相惜两心知，得一知音死不辞”，她还以诗鼓励小淑投身革命“时局如斯危已甚，闺装愿尔换吴钩（吴钩指刀剑，因古代吴地出产的一种弯形刀而得名）！”

徐家父母对女儿们受些教育还赞成，但看到她们与秋瑾相识后的思想变化，就反对她们与秋瑾的交往。尤其是徐寄尘，不仅父母要干涉她的自由，婆家也要干涉她的行动。可是徐寄尘在秋瑾的革命思想和热情的感染下，始终没有屈服，并且在以后的日子里，尽力协助秋瑾从事革命事业。

秋瑾在浔溪女校的时候，对学生关怀无微不至，受到学生爱戴。但是，反动的校董金子羽，容不得秋瑾的言行，于是捏造说学生家长有意见，讥讽秋瑾辞职。秋瑾在暑假时离校，学生们痛失良师，许多人为此哭泣几日。徐寄尘也愤然辞职，徐小淑听从秋瑾的意见转而到上海爱国女校继续学习。学生吴希英坚决要求随侍秋瑾，后来吴希英一直跟随秋瑾参加革命。秋瑾被捕后，她为了纪念秋瑾名为吴惠秋。秋瑾以她的赤诚赢得了众多女同胞的信赖，并结下了情同姐妹、生死相托的深厚友谊。

秋瑾离开南浔后来到上海，与光复会员尹锐志、陈伯平等在上海虹口祥庆里设立了“锐进学社”，作为光复会在上海的联络点，开展革命活动，并以更大的热情和毅力，投身于妇女解放的宣传、组织工作。

随着阅历的加深和视野的扩大，秋瑾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2000多年来封建纲常伦理的统治和影响根深蒂固，妇女要想争取平等和解放，必然会遇到重重阻力和障碍。孤立无助的个人，单枪匹马的斗争，绝对挣脱不了整个封建社会施加在广大妇女身上的枷锁。因此，她要积极倡导妇女为自身的解

放而团结斗争，怎样才能使妇女觉醒呢？她认为首先需要一块妇女自己的舆论阵地。当时国内只有一种面对妇女的刊物《女子世界》，还是刊登文言文的文章，这样深奥的文法，那时中国能读懂的女子极少。秋瑾决心另外创办一种文字通俗易懂，适于更多女子阅读的杂志《中国女报》。

办刊物需要资金，要让“热心的志士”投资就必须让人了解刊物的宗旨。秋瑾手拟了《创办中国女报之草案及意旨广告》，她提出创办《中国女报》的宗旨，是为了“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要求“热心志士”以资捐助。广告在上海《中外日报》上登载，并印送各女子学校。她还四处奔走筹款，原计划集资一万元，可是过了不少日子，入股的仅四五个人，集资金几百元。中国当时女界的蒙昧，封建势力的阻挠，给秋瑾的办报行动带来了许多困难。然而秋瑾是一个百折不挠，勇于战胜困难的革命者。《中国女报》一定要出，哪怕是“和血和泪”，为的是“不忍使我最亲爱的姐妹，长埋在这样的地狱中”，这是秋瑾在《敬告姐妹们》一文中的表述。

筹措经费的艰难，使秋瑾不得不想到去湖南夫家诱款。已是秋冬季节，她风尘仆仆地来到湖南王家。王黻臣深感意外，以为是秋瑾走投无路只好回到夫家。当时王廷均仍在北京，为了使秋瑾能与儿子和好，王黻臣热情地接待了秋瑾。分别多年，秋瑾向他说起这些年在外的艰难，经济的拮据，王黻臣为了表示自己关心，交给她一笔数目不算少的钱，希望她从此安下心来在王家住着。为防秋瑾逃跑还派人留意秋瑾的行动。几天之后，适逢邻居家演戏，秋瑾便利用看戏的机会，中途溜走，路经长沙，回到了上海。在秋瑾极需资金时还得到了徐家两姐妹的鼎力相助。徐自华脱离了婆家，变卖田产来到上海，两人捐助 1500 多元。终于凑集了必要的资金。

1907 年 1 月《中国女报》第一期出版了。这是 16 开本的杂志，封面中间部分从右上方向左下方斜写着“中国女报”四个蓝色大字，右下方的空白处画着一位妇女，双手高擎一面旗帜，象征着妇女的觉醒与前进。这期刊登了秋瑾的发刊词，她谈到办报的目的和作用“欲结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息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关，使我女子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速进于大光明世界。”

3 月，第二期《中国女报》又出版了。这期纸张、印刷优于上期，形式也更多样化，有议论、故事、评文，还有秋瑾作的歌曲《勉女权歌》。

《中国女报》上刊载的所有内容都以白话文写作。秋瑾本人就发表多篇文章，诗和歌曲。这些都是她宣传妇女解放斗争的杰作。由于她本人亲身尝受了封建制度的压制，使她手中的笔更具战斗力；深刻而生动地描绘妇女一生的悲惨遭遇；愤怒而尖锐地批判重男轻女的谬论；冷静而深刻地揭示女子受压迫的原因，并提出了妇女解放的一系列主张。

秋瑾描述妇女从呱呱坠地起那刻就遭到“生个女儿何足道，无非是个赔钱货”的冷遇。小时候还要受缠足的痛苦“骨断筋缩多痛苦，行走何得自由。”长大了女子在婚姻上要听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必须做到“女儿守节须从一，男子无妨置众妻”，还不许妇女抱怨，否则“丈夫就可打骂，也没有人说他不应该的。”她还指出：古往今来，有多少妇女受迫害以“服砒、吊颈与投河”，来结束自己悲惨一生。秋瑾愤怒地责问“为什么这样不公道”？

为了争得男女平等的地位，秋瑾痛斥“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等等封建的伦理道德。她从男女平权的观点出发指出“天生男女，四肢五官，

才智见识，聪明勇力，俱是同的”；天职权利，亦是同的；只是因为妇女从小受禁锢，“不读书，不出外阅历，不出头做事”，才使妇女受到“低人一等”的歧视，而 2000 年来的封建伦理便以此鼓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谬论。秋瑾经过深思认识到，女子受压迫的根本原因是经济不能自立，“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男子。”真是切中问题要害。她又明确地提出妇女解放必须求得自立，如何自立？“非求学艺不可，非合群不可”。所谓“求学艺”就是要大兴女子教育事业，使女子有了知识，可以“做教习，开工厂，何尝不可以自己养活自己”。所谓“合群”就是妇女组织起来，结成团体，为自身的解放而团结斗争。

秋瑾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中最可贵的地方在于她认识到，只有在社会的解放之中妇女才可能获得解放。她号召妇女把争取自身的解放同推翻清朝政府的斗争结合起来，“扫尽胡氛安社稷，由来男女要平权。人权天赋原无别，男女还须一例担。”秋瑾本身就是这个主张的最好实践者。她身为一女子，为了拯救祖国的危亡，东渡日本求学，参加革命团体，为女同胞觉醒奔走呼号，她对妇女解放运动的认识达到那个时代的最高境界。

然而，由于经费断源和杂志销路不广，《中国女报》在出版了第二期后被迫停刊。对此，秋瑾深感痛苦。但她没有气馁，她的坚强性格决定了她会以百倍斗志投身到革命武装斗争中。

五、全力以赴组织起义

秋瑾在办报的同时，还与陈伯平等人暗制炸药，不慎将手炸伤。为了躲避巡捕的追查，秘密地住在吴芝英家。（当时吴芝英已与丈夫居住在上海）1907年初一个冬日的下午，徐锡麟派浙江寻阳会党头目王金发找到秋瑾。秋瑾久闻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王金发，不禁欣喜万分。晚上秋瑾备酒待客，两人都是性格豪爽之人十分相投。原来徐锡麟已经捐官，被派往安徽，特邀秋瑾去绍兴主持大通学堂的，担负浙江方面组织起义的工作。徐锡麟到安徽后发展革命力量以求日后两省呼应，进取南京。两人还畅谈了各地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一致认为这是武装反清的大好机会。这时筹办《中国女报》之事，基本就绪。秋瑾高兴地接受了徐锡麟的邀请，心情激动，不禁挥刀起舞，边舞边对王金发说：“新的战斗就要开始，驱除鞑虏，解放千万同胞的重任在我们身上，我觉得太激动太兴奋了！”

秋瑾于1907年农历正月，正式接任大通学堂督办，主持学堂各项具体事务，为武装起义作准备。

大通学堂全称“大通师范学堂”，是徐锡麟、陶成章在1905年创办的。当时清政府正搞废科举，办学堂，在绍兴主持光复会活动的徐、陶两人，便以办学掩护革命活动，还可以培养军事人才。徐锡麟选中了家乡东浦大通桥旁的大通寺作校址，可他父亲思想顽固，反对儿子办校，最后改在绍兴城内的豫仓开办，但校名仍为“大通”，大通学堂明确训练学生兵式体操，声言今后毕业的学生将帮助政府实施征兵，为本乡办团练等，为了避免被怀疑改称“大通体操学堂”。徐、陶等人还设法从上海购买了50支枪、两万发子弹。

从上海到达杭州后，秋瑾先在西湖南屏山下的白云庵里与徐锡麟等人会面，共同商讨今后的活动方案，拟定安徽、浙江两省同时起义，以安庆为重点，绍兴为中枢，金华、处州（今丽水）等地同时发动，占领两省重镇之后，攻取南京。安徽方面由徐锡麟负责，浙江方面由秋瑾负责，陈伯平负责两地的通讯联络。方案确定后，徐锡麟慷慨激昂地表示：“法国革命80年始成，其间不知流过多少热血，我们处在革命初创阶段，也应当不惜流血，我这次到安徽去，就是准备流血的，请各位切不可存退缩的念头！”

秋瑾主持大通学堂之后，每天或骑马，或乘船来往于和畅堂住所与学堂之间，早出晚归把精力全部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中。她经常身穿男子体操军衣，怀藏勃郎宁手枪，腰佩倭刀，骑着马指挥学生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据当时在大通学堂读书的学生回忆说：“除星期日外，每天第一课起，三课兵式体操要跑几里路外的大校场去操练。有时朝露未干，青草没胫，教师喊五百、六百米达卧倒，预备放，学生们不问马屎牛粪，毫不犹豫地卧倒下去，并假想敌人在前，眼亮手准地动作起来。”严格的军事训练，使学员克服了散漫习气，掌握了简单的军事知识。武装斗争中的骨干，在大通学堂中成长起来。

大通学堂办得红红火火，却遭到地方劣绅的反对。他们不仅仇视秋瑾男装骑马带兵的举动，更竭力阻挠秋瑾筹办“体育会”，招收女生，组织女国民军。还在农历二月的一天散发传单，攻击大通学堂为“匪巢”。师生们很痛恨这些劣绅的卑鄙行为，绍兴知府贵福反而训斥学生“不安分”包庇了劣绅。

与清政府官员建立必要的关系才能掩护革命工作，减少土豪劣绅的干扰。秋瑾通过贵福幕中一位姓徐的亲戚，结识了贵福。在大通学堂开学典礼

时，请贵福和山阴、会稽两县知县到会致颂词。贵福为附庸风雅，将秋瑾的别号“竞雄”两字拆开，凑成一副对联“竞争世界，雄冠全球”送给了秋瑾。有了这顶“保护伞”，尽管劣绅们仇视大通学堂和秋瑾，但不敢公开反对，同时也掩护了革命党人的地下活动。

革命形势发展迅速，为了及早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秋瑾不辞辛劳，经常披一条黑色羊毛围巾，奔波于金华、义乌、杭州等地，秘密联络会党、新军、武备学堂和弁目学堂，宣传联合起来共同抗清的思想，积极发展革命组织。

会党是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一切主张反清复明的民间秘密团体的称呼。浙江是会党历史悠久，分布很广的省份，会党势力几乎遍布全省。各会党有自己口号、暗号、规矩，只有联络起来才能统一行动。有一次，秋瑾只身奔波兰溪找当地会党头目蒋乐山，劝他抓住时机与其它力量同心协力共同举事。她还写了一首长诗赠给蒋乐山，诗中充满了对蒋乐山的希望和勉励，“画龙须画云中龙，为人须为人中雄。豪杰羞伍草木腐，怀抱岂与常人同？”“协力同心驱满奴，宗旨同时意气洽，危局如斯敢惜身？愿将生命作牺牲。”经过秋瑾的努力终于将各地会党以结盟形式团结、统一起来。各会党首领倾服秋瑾的英气豪骨、肝胆卓见，都愿服从秋瑾的指挥。

联络会党的同时，秋瑾还在新军和武备学堂、弁目学堂中做工作。

新军是清政府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于1894年开始筹备编练的新式陆军。新军使用新式武器，实行征兵制。1905年起在全国各省普遍编练，到光绪末年，全国已编成九镇（每镇相当于一个师）。新军的军官是国内各军校的毕业生或者留学回国的学生，士兵则多数是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其中有不少官兵，虽然身在清朝军队中，但经受过革命思想的熏陶，耳闻目睹清朝统治的腐败，不满现状同情革命。因此，新军是革命党人争取的重要力量。

浙江武备学堂坐落在杭州城东蒲场巷，是培养中下级军官的学校。1906年至1907年在杭州的新军中很多学生毕业于武备学堂。杭州的同盟会员和光复会员，主要是这个学堂的学生，同时这里还是辛亥革命时期杭州革命党人活动的主要基地。弁目学堂是蒋尊簋（浙江籍参加同盟会的第一个人，当时是杭州第二标标统），在1906年筹编新军第二标（相当于团）时创设的，培养军队班长一类的初级干部。

秋瑾多次到杭州，有时登上紫阳山，有时泛舟西子湖，在山路间在小船上与武备学堂、弁目学堂的学生或新军中的官兵秘密联络，为了在起义时能顺利地进攻和占领各要害之地，秋瑾还秘密察看了杭州城厢内外的街道和出入路径，绘制成军事地图。

短短的几个月里，秋瑾已经同浙江各地会党、驻杭新军、武备学堂和弁目学堂的学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共吸收600多人加入光复会，扩大了革命力量。

为了便于指挥分散在各地的会党，有利于武装起义时统一行动，秋瑾于1907年4月间，把所联络的会党统一编组为16级，以“黄河源溯浙江潮，为我中原汉族豪。不使满胡留片甲，轩辕依旧是天骄”这首七绝诗为标记，从“黄”字到“使”字16个字代表16个等级。“黄”字为“首领”，由徐锡麟担任，“河”字为“协领”，由秋瑾担任，“源”字为“分统”，由各会党首领担任，“溯”字为“参谋”，以“洪门”、“红旗”担任，“浙”

字以下为部长，副部长等。各级职员都有金戒指为记号，戒指中嵌入表示自己职衔的那个字，或嵌英文字母 A、B、C 等代替。

5 月中旬，秋瑾在杭州白云庵召集了浙江各会党和军学界首领的秘密会议，正式组织光复军。徐锡麟从安庆赶来参加会议。他们把会党和光复会编成八个军，用“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个字作为每一军的编号，总称“光复军”。每个军都设置包括大将、副将、参谋等 13 个军职。规定以白底黑色“汉”字为军旗，以内书黑色“复汉”两字并盖上图章的黄色小三角形旗作为顺旗。还规定了军服、头布、肩章、胸带等的具体式样。至此，武装起义的组织工作大体就绪。

即使在紧张地从事武装起义的组织工作时，秋瑾也没有忽视宣传的重要性。她用热情激越语言写下了很多诗词、文章，包括准备在起义后随处张贴的《普告同胞檄稿》、《光复军起义檄稿》等文件。这些重要文件，藏在大通学堂的寝室里，以备起义时宣传、教育和发动群众。

武装起义的组织、宣传工作基本就绪后，秋瑾等人开始着手光复军起义的具体行动计划和日期。准备先由金华起兵，处州响应，待杭州清兵前去镇压时，绍兴起义军立即渡钱塘江袭击杭州，与驻杭州的新军及武备、弁目两学堂的革命党人，里应外合，一举夺下杭州。若此计划不成，则起义军返回绍兴，取道金华，经江西入安徽，与徐锡麟的起义军会合。在浙江起义的同时，徐锡麟也在安庆发动起义，两省配合争取先占各省要地，然后会合夺取南京。起义的行动日期初步定于 1907 年 7 月 6 日。

起义需要武器，这是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秋瑾又开始为购买武器四处筹款，她再次找到徐寄尘求援。情同手足的姐妹为了革命遇到困难岂能不助！这次徐寄尘把自己的全部首饰拿出来（约值 30 多两黄金）交给秋瑾，平时豪放的秋瑾感动得久久握着徐寄尘的手，说不出一句话。一会儿，秋瑾取出身藏的一对翠钏送给徐寄尘留念，并共同回忆起前两个月二人在杭州登山时的情景。

阳春 3 月，杭州一扫冬日的阴冷，春光明媚。秋瑾约徐寄尘去登山，来到凤凰山顶鸟瞰西湖全景，一派迷人景色：泛着新绿的垂柳随风轻舞；初绽的桃花一片粉红似朝霞落地；西子湖面波光涟漪轻舟点点，远处群山迭嶂，树木葱笼，间或有轻烟袅袅升起。祖国大好河山却遭到列强侵占和清政府的腐败统治，一股激情涌上秋瑾的心头，不禁涕泪纵横。走下山来到岳飞墓前，秋瑾久久徘徊于此，脑海中浮现出南宋被金欺辱的景象和岳飞气吞山河的感人诗词《满江红》，想到自己正在为国家前途奔波……。

“你是否希望死后也埋葬在西湖边？”徐寄尘见她沉思良久，不禁轻声问道。

“如果我死后真能埋骨于此，那可是福份太大了啊！”秋瑾无限感叹地回答。

“如你死在我前，我一定为你葬在这里，但如果我先死，你也能为我葬在这里吗？”徐寄尘又问。

秋瑾笑道：“这就得看我们谁先得到这个便宜了。”

回想起这些谈话，秋瑾缓缓地向徐寄尘交待：“如果我不幸牺牲，愿你把我埋在杭州的西泠。”临别时又留下一张小照。秋瑾已意识到这次武装起义事关重大，自己很可能付出宝贵的生命。这时她已作好为国牺牲的思想准备。

六、一腔热血染中华

光复军武装起义的计划制定以后，秋瑾风尘仆仆地赶到上海，会见从安庆前来接头的陈伯平，请他将这个计划报告在安庆的徐锡麟，约定浙江、安徽两省配合行动，同时举行起义。

但是，在还没有得知秋瑾在浙江的行动计划之前，安徽方面的革命活动就出了意外。由于叛徒出卖，徐锡麟的革命党人身份行将暴露。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徐锡麟只好决定立即动手提前行动。

1907年7月6日上午，安徽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按照常例，巡抚恩铭和省里的一些文武官员前来参加典礼仪式。官员们一一进入礼堂就坐。毕业生分作官生、兵生两班站立台下，徐锡麟率教员们站在台前，一旁是与他一同密谋举事的陈伯平和马宗汉。

典礼开始了。先由官生班毕业生向恩铭等人鞠躬行礼，恩铭等人回礼。接着轮到兵生班行礼，这时，徐锡麟突然转过身来，向恩铭举手行礼，呈上学生名册，同时大声报告：“回大帅（指恩铭），今日有革命党起事！”——这是事先约定好的行动讯号。恩铭吃惊地问：“徐会办从何得知这个讯息？”话音未落，陈伯平已经一个箭步跨上前来，朝恩铭猛力投去一枚炸弹，但炸弹落地未炸。不等惊恐万状的恩铭清醒过来，徐锡麟又高声呵道：“大帅勿惊！这个革命党，职道（徐本人自称）终当为大帅拿到！”说着从靴统里抽出两把手枪，左、右手各执一支，冲着恩铭连开数枪。陈伯平和马宗汉也同时向恩铭开了枪。恩铭身中七弹，倒在血泊中。礼堂里顿时乱作一团，失魂落魄的官员们什么也顾不得了，一个个抱头鼠蹿，仓皇逃命。恩铭被其随从乘乱抬走，回到巡抚府便一命呜呼了。

徐锡麟带领30几名学员冲出学堂大门，直奔安庆军械所，打算夺取存放在那里的武器。不想在那里被清军包围。经过四个小时的激战，打死打伤清兵100多人，陈伯平等英勇战死，徐锡麟和马宗汉受伤被俘，先后悲壮就义。

安庆起义失败后，清朝政府在江西九江抓到了徐锡麟的弟弟徐伟。徐伟供出了徐锡麟的妻子王淑德留学东洋，改名徐振汉，与秋瑾一道提倡革命的情况。安徽新上任的巡抚立即把这一情报电告了浙江巡抚张曾敳。

此时，秋瑾正在浙江紧张地从事起义的准备工作。她又一次亲赴杭州，与驻杭新军和武备学堂中的革命党人联系，并从大通学堂选派了32人潜往杭州，与杭州革命党人一道作为起义时的内应。也许是准备不及还是别的什么原因，秋瑾把发动起义的日期由原定的7月6日推迟到7月19日。

在统一行动之前，张弓待发的浙江各地光复军和会党力量却屡屡发生不测。有的因商量不周而先期行动，有的因不慎泄秘而遭到破坏，有的因内奸捣乱而受到摧残。这些一连串的事件，不仅大大削弱了革命力量，而且打草惊蛇，引起了清政府的密切注意。他们发现许多线索都来自大通学堂，难道这里是浙江革命力量的中枢？

就在这时，曾经在日本留学时被秋瑾当面斥之为“死人”的胡道南向绍兴知府贵福密告了“大通体育会女教员革命党秋瑾及吕凤樵、竺绍康等谋于六月初十（即公历7月19日）起事”的情报。一得到这个重要情况，贵福立即于7月7日前往省城向张曾敳作了报告。

7月9日前后，安庆起义失败的消息通过上海的报纸传到绍兴。革命遭

挫折和同志被残杀的巨大打击，使秋瑾悲恸已极，茶饭不思。这时，浙江方面的风声也越来越紧。有人劝说她暂时到别的地方去躲避一段时间，甚至还为她联系了在上海法租界隐居的具体地方。但秋瑾考虑到对革命的影响，毅然谢绝了朋友和同志们的好意。她借用佛教中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对革命事业宁死不渝、义无反顾的决心：“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秋瑾把收藏在家里的秘密书刊、往来电函整理起来，托她执教浔溪时的学生吴珉带走烧毁。还给另一个浔溪女校的学生徐双韵寄去了一首近乎于遗嘱的长诗：

“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日暮穷途，徒下新亭之泪；残山剩水，谁招志士之魂？不需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好持一杯鲁酒，他年共唱摆仑歌。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志犹虚，雄心未满，中原回首肠堪断！”

字里行间表露出一种对革命未成、壮志未酬的惋惜之情，同时也反映出秋瑾由于看不到人民的力量，看不到光明的前途，而陷入了无尽的悲哀。

安徽新任巡抚的来电、绍兴知府贵福的报告以及浙江各地接连不断发生的事件，使张曾敳确信绍兴大通学堂和秋瑾等革命党人就是清政府在浙江的最大威胁。于是，一只巨大的魔爪伸向大通学堂，伸向了秋瑾和她的同志们。

7月11日，杭州新军300多人奉命前往绍兴逮捕秋瑾等人。临出发前，因担心官兵中有人与光复会暗中相通而走露风声，便强行对全体兵士搜身检查，在军营中引起了骚乱。附近武备学堂的学生闻讯后，立即派人去绍兴报信。7月12日，秋瑾得到这个消息后，她全然不顾个人的安危，立即带领留在学堂的学生们把枪支、弹药收藏起来，不让武器落入敌人手中。

7月13日下午，杭州派来的新军在绍兴知府贵福、山阴县知县李钟岳、会稽知县李瑞年的带领下，包围了大通学堂。这时学堂里只剩下三十七名学生和秋瑾等几位教员。情况万分危急。有人想最后说服秋瑾赶紧从学堂后门逃走，但被秋瑾坚决地拒绝了。她命令其他同志赶快突围。于是有人从前门冲出，有人由后门逃走。随着一阵密集的枪声，清兵从学堂前门攻入，有两名学生在出逃中牺牲。最后，秋瑾和教员程毅等六个落入敌人的魔爪。

秋瑾被官兵反缚双手押到绍兴知府衙门，当天晚上就受到严讯。

先是知府贵福升堂审讯。他严厉喝令秋瑾招供革命党的名单、活动和和其它有关情况。面对凶神恶煞般的贵福，秋瑾斩钉截铁地回答：“论说稿是我所做，日记笺折亦是我办，革命党之事，不必多问！”

见硬逼不成，贵福便改换话题，问道：“你真与徐锡麟相识吗？”秋瑾回答：“曾经相识。”贵福又进一步追问：“那么，你还同哪些人有往来？”秋瑾机敏而又轻蔑地反问道：“你不是也常到大通吗？还赠我‘竞争世界，雄冠全球’的对联，并一同在大通拍过照相。这些，你都不曾记得？”愚蠢的贵福似乎当头挨了一棒，狼狈不堪地宣布退堂。

第二天上午，贵福令山阴县知县李钟岳在县衙门的花厅里再次审讯秋瑾。

李钟岳企图用软功套出实情。他派人在花厅右边放了一把椅子，让秋瑾坐下，声调平和地问道：“你是不是革命党？”秋瑾回答：“是的。”“你参加革命党干什么？难道不知道这是犯法的吗？”“我所主张的是男女平权，我并不知道这触犯什么刑律”

几个回合下来，李钟岳一无所获。于是，就叫人拿来纸和笔，要秋瑾写

笔供。

秋瑾提起毛笔，凝思了片刻，落笔先写个“秋”字，就停笔思索起来。李钟岳以为有了盼头，迫不及待地催她继续写下去。立时，一股对革命失败的哀惋之感，对祖国命运的担忧之情涌上心头，秋瑾情不自禁地挥笔疾书，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大字。这就是她交给清朝政府的唯一“笔供”。

穷凶极恶的敌人并没有就此罢休。贵福又改派自己的幕僚余某，用酷刑逼迫秋瑾招供。但是不论敌人怎样用刑，秋瑾宁折不弯，宁死不屈，始终“坚不吐实”。

本以为抓了个要犯可以请功求赏，不想从秋瑾嘴里没有得到任何对自己有用的东西，贵福恼羞成怒。同时，他又十分害怕浙江各地光复军闻讯后进攻绍兴，前来营救秋瑾，于是决定尽快杀害秋瑾。贵福一面叫人编造了所谓的《秋瑾口供》，向上司应付交账，一面致电张曾勳，要求马上处死秋瑾。张曾勳当即批准了贵福的请求。

1907年7月15日（农历六月初六）凌晨3时，黑暗笼罩着绍兴城。这时，山阴县监狱的大门被打开了，外面站着一群荷枪实弹的清军。见到这个情景，秋瑾马上明白了一切。她从容地整了整自己的衣装，提出要同山阴县知县李钟岳见面，向李钟岳提出三个要求：第一，写信向亲友们告别；第二，临刑时不许脱她的衣带；第三，死后不要枭首示众。李钟岳答应了后两个要求。于是，秋瑾带着脚镣走出牢房，向着清政府设在轩亭口的刑场走去。

来到刑场，秋瑾神情自若，举目四望，向亲爱的祖国，向故乡的父老兄弟姐妹们作最后的告别，然后安详地闭上了双眼。……这一年，她只有30岁。

秋瑾被残杀以后，整个社会舆论都深切同情她和她所从事的革命事业。清朝反动统治者的血腥暴行，不但没有吓倒广大人民群众，反而加速了它自己的孤立和灭亡。

秋瑾的殉难，就像一部教材，使原先不知道她的人，开始接受革命的教育。即使是那些平时思想守旧，并不同情革命的人，也纷纷指责清朝政府的暴虐无道。贵福和张曾勳两个坏蛋由于遭到全省人民的强烈反对，以致于无法继续在浙江呆下去。

秋瑾的牺牲，犹如一颗火种，进一步燃起反清斗争的烈火。从1907年7月下旬到1908年春夏之间，浙江各地的光复军余部和会党组织，不约而同地举行起义为秋瑾复仇。此起彼伏的武装斗争浪潮，猛烈地冲击着清朝政府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浙江的革命党人很快起兵响应，全省11个府都推翻了清朝政权，其中许多重要的革命党人都是秋瑾生前的同志或受过她影响的人，有不少还是秋瑾亲自发展加入革命党的。可见，秋瑾生前的革命活动和她的壮烈牺牲，对浙江的革命斗争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没有也不会忘记100多年来为了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事业前赴后继、英勇牺牲的先烈们。秋瑾，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女英雄，几十年来一直受到人民深深的敬佩和怀念。解放后，轩亭口那块刻有“秋瑾烈士纪念碑”七个苍劲大字的高大纪念碑被修饰一新；秋瑾故居“和畅堂”32号还在1957年秋瑾牺牲50周年时开辟为纪念馆，由何香凝题词。这里的一切，都照当年原样陈放。展览的实物中有她睡过的一张旧式红漆木床，从日本回国时带来的倭刀，串连浙江会党时经常围戴的黑色已有破洞的羊毛头

巾。杭州市人民政府于 1959 年春在苏堤跨虹桥东侧，重新修建了“风雨亭”，文学家叶圣陶题写了亭名。1981 年 9 月在西子湖畔重建了秋瑾墓，并在万绿丛中竖立起一尊洁白的烈士全身雕像。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随着时间的推移，秋瑾所生活和战斗过的那凄风苦雨的年代，离我们越来越久远了。但是，秋瑾等无数革命先烈那种高尚的革命情操、坚定的革命意志、富于牺牲的革命精神，却永远是中国人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富。他们的光辉名字与英雄事迹，将不断激励着亿万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勇往直前，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